

带领义乌“戚家军”抗倭,以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浙江革命志士为主体的光复会……,一脉相承的是浙江文化历史积淀与时代的完美结合。而这些根植于历史传统中的自主意识和战斗精神,为浙商精神的现代建构提供了历史和文化基础。民营经济的崛起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平民革命,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

过那么多人卷入那么一场人人奋斗求自我解放、进而摆脱贫困和愚昧的和平运动。而正是那些宝贵的历史文化底蕴让浙商精神站在了中国崛起的前列。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这种浙商精神也对浙大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求是精神”是历代浙大人的精神灵魂和思想瑰宝。

新时代浙商精神的历史方位

陈国权 陈洁琼(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回顾浙商发展的历史,无论是近代以来,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浙商创造了一个个商业传奇。在这辉煌商业历史的背后,都以浙商所具备的独特精神作为引领和支撑。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浙商的精神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在传承中创新,在审时度势中与时俱进。当前,在新时代背景下,浙商必然面临着新经济、新政治的挑战和机遇,浙商只有在新时代中找准浙商精神的历史方位,才能引领中国经济腾飞,再创辉煌成就。

一、浙商精神引领下的经济腾飞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快速崛起与成长,成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期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浙江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背后折射出浙商的勤劳智慧和审时度势的能力。浙商是中国沿海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企业家群体,活跃于海内外各行各业商业舞台,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行榜上,约有三分之一是浙商。浙商的蓬勃发展以及浙江民营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的关注和兴趣。浙商数十年的斐然成就不只是改革洪流中偶然溅起的一朵浪花,更是浙商长期沉淀而来的独特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必然彰显。

改革开放前期,浙商发扬了“走尽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创业精神,成就了浙江民营经济的辉煌。1978年,

浙江省GDP总量为123.72亿元,位居全国第12位,2016年的GDP已经增长到了47251.36亿元,是1978年的382倍,且多年来浙江省的GDP总量稳居全国第4位。其中,浙江省的私营经济贡献了将近半壁江山,仅从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看,浙江私营企业就高达28399.15亿元,占总值68953.40亿元的41%左右。浙江经济的腾飞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这背后折射出浙商在改革开放初期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四千精神”、“三板精神”和“两吃精神”都试图对这一阶段的浙商精神进行提炼和刻画。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浙江民营企业的自身局限异常突出,在经济危机中受到了很大创伤。浙江民营企业规模不大,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产品附加值不高,以加工产品为主;高技术产业占比低,以低端产业为主等问题都制约着浙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管理模式都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求。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浙商的以“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拓展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为内涵的“新四千精神”应运而生。如果说原有的“四千精神”概括了浙商艰苦创业的精神,那么“新四千精神”则是刻画了经济转型升级时浙商不破不立的精神。

从“四千精神”的提炼,到“新四千精神”的再定义反映了社会各界试图对浙商具备的独特精神作出一种较为精准的归纳。但也由此可见,浙商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继承中创新和发展,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商业精神。

二、新时代呼唤浙商精神再升华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的概念,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这一重要历史阶段,意味着外部环境的诸多变化,浙商若要在“新时代”中勇立潮头,必然需要有一种新的浙商精神与之相适应。那么,对新时代浙商精神的提炼,关键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在新的时代,企业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商业精神能够让自己勇立潮头,能够在竞争中占领先机;第二,浙商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缩影,如果要引领这个时代的发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精神?在回答这两个核心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回到新时代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的讨论上来。只有先明晰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方位,才能研判当下以及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浙商精神来与之相匹配。

新时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我们做研究时可以将新时代的概念放在新经济、新政治、新社会这样一个思维框架来分析。对于新时代浙商精神命题的破解可以拆分为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我们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精神才可以胜出?对新经济怎样去展望和研判?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强,所以,一方面,对未来新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直接关系到未来企业家所应具备的精神讨论;另一方面,企业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精神来应对这样未来的不确定性本身也值得讨论。第二,在新的政治生态下,企业家应该与政府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当前的政治环境的主要变化是什么?未来还可能存在哪些变革趋势?

三、新经济格局下弘扬企业公共精神

对于新经济的讨论和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和广泛,不同的学者基于视角有不同的定义。但是,站在中国企业的视角来看,相比于前两个阶段,中国的新经济至少蕴含了两个较为显著的特征: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全面加深给企业带来的竞争挑战;二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企业带来

的变革压力。经济全球化要求浙商具备全球的视野来看待全球的问题,文化的差异、资源整合等要素都应当被考虑在商业创新之中。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的变革了现有的商业模式,颠覆了消费者的生活习惯,重塑了用户的价值理念。新技术日新月异,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大量的商业模式创新、企业产品创新。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新概念,包括“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等,都体现了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求新求变的发展思路,展现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的趋势。从另一个层面看,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又是驱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深的一股革命性力量。它正在不断破除地域的限制,“海淘”、“全球购”等新经济现象的出现,越来越表明技术驱动下经济、社会形态重塑的强烈需求。

当前新产业、新业态、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但对于新经济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继续展望。当下讨论新浙商精神的时候,应该成为新经济条件下优秀商业精神的一种探索,如果无法准确把握新经济,就很难提炼出新商业精神。企业家是新经济中最为敏感和最有前瞻性的群体,在新经济格局下,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浙商自身对此的思考尤其值得重视。2016年,马云曾在浙江商会成立三十周年的大会之际提出“千差万别、千变万化、千思万想、千家万户”的“3.0版本的四千精神”来适应新经济发展。2018年1月16日,阿里巴巴集团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新经济、新智库”的会议。会议上两个重要的理论热词:一是“共享”,二是“普惠”。回顾这几年的商业创新模式,如“网约顺风车”、“共享单车”、“Airbnb”等以互联网技术、平台作为支撑,在“共享”、“普惠”的价值理念中蓬勃发展起来了。而在传统的思维中,“共享”、“普惠”问题恰恰是政府需要解决和思考的问题,比如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就强调“共享”和“普惠”原则。还有就是具有公有制背景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可以分为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和提供商品的国有企业,其中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国有企业,显然需要像政府一样具备公共精神。但是,现在民营企业也在强调“共享普惠”和“公共精神”,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现象。

这些现象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即在未來新經濟中,企業家在創始時期強調對企業利潤的追求,只有先有盈利,才能使企業在異常激烈的競爭中存活下去,但是隨着企業的成长,僅僅以盈利作為企業的价值追求是遠遠不夠的。事實上,在這些會議上許多大企業家的發言折射出其背後的价值關懷,而這些价值關懷是有別於一般中小企業的,他們正在更多的強調和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公共精神。這是小企業成長為大企業之後的一種价值選擇,同時也是小企業要成長為大企業所需要的一種精神引領和先決條件。

當下強調的公共精神、普惠精神和共享精神,其內核是與傳統“義利並舉”的浙商精神一脈相承的。“義利並舉”的商業精神曾經携領浙商成就非凡的商業傳奇,當下話語體系中的“公共精神”、“普惠精神”和“共享精神”也將引領浙商在未來的新經濟中突顯優勢和激發活力。

四、新政治格局中樹立“親清”浙商精神

中國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国家,中國的政治與經濟之間緊密相連,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同時,不得不格外關注中國的政治導向。我們討論中國的新經濟,也就必須關注中國政治生態的變化。我們在研究中发现,政商關係是一個国家經濟發展很關鍵的問題。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政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政治就必然呼喚新的浙商精神,那麼,這裡就需要回答兩個問題:新政治具有什麼特征?新政治中企業家與政府官員應該建立什麼樣的關係?

中共十八大以來,許多官員因經濟腐敗問題紛紛落馬,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對領導幹部提出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交往成為君子之交,做到“親”、“清”兩字。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又明確指出:“构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這些論述奠定了新型政商關係的构建原則和方向。習總書記提出的“親清”更多的是對政府官員的要求,即官員對企業家既要親近,又要清廉,所以是“親清”。事實上,在新政治格局中,在回答浙商需要具备什麼精神時,應該將這種討論放在构建怎樣的新型政商關係的框架內。因此,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基於“親”、“清”兩個維度進行把握:

一方面,企業家需要與政府建立“親近”的合作關係。事實上,企業家很需要這個精神,但是很多企業家很排斥,如果很排斥就處理不好和政府的關係。在今天中國這麼一個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国家中,企業家如果要把企業做大必須和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因為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決定政府掌握了大量的關鍵性資源。“親”還有一層意思是強調企業與政府的真誠交流。比如,十八大以來,隨着新一輪的行政審批改革的深化,“減政放權”、“政府流程再造”等涉及商事的改革與民營企業的發展息息相關。如果要使改革切中要害,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那麼也少不了企業家與政府的真誠溝通。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家與政府构建“親近”的合作關係十分有必要。

另一方面,企業要真正永續發展,又必須和政府保持“清廉”關係。十八大以來一個顯著的現象是中國大量企業家因行賄等原因被關了起來,這些企業家過去和政府官員關係“很好”,隨着政府官員的落馬他們也紛紛倒台。在強調政企合作的同时,也要把握友好關係的尺度,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線,堅守正派的经营方式,樹立正確的義利觀,避免行賄等腐敗投機行為。京東集團的劉強東在今年的兩會上也告誡創業者,新時代更加強調正道成功,构建親情政商關係。這也是企業家對於新政治的清醒認識。

所以,在新政治中,企業家既需要加強與政府合作關係,也要與政府保持清廉關係。習總書記提出的构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我們可以理解為不只是針對政府官員,也是針對企業家的。這也是新政治中探索新浙商精神需要把握的原則和認清的現實格局。

新時代是各領域處於重大變革的時期,浙商只有具備新的商業精神才能引領自身實現跨越式發展,才能在中國經濟再次騰飛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從“四千精神”到“新四千精神”,再到浙江省委書記車俊提出的“六個精神”以及我們今天對新時代浙商精神的討論,都反映了社會各界對浙商精神价值的重視。從浙商的發展歷程可以发现,浙商精神的演變、升華和提煉始終需要結合經濟、政治、社會的外部變化。只有這樣,才能提煉出符合當前和未來發展趨勢的新浙商精神,讓浙商立于不敗之地。